

王国维与朱光潜悲剧观之比较

田 广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在将西方悲剧理论引入中国并确立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过程中,王国维和朱光潜是两位关键性人物。比较二人悲剧观念之异同,对于考察中国悲剧理论与观念的现代发生及其演进,当有启发意义。王国维悲剧观的核心是“解脱”,而朱光潜则更关注“快感”,在西方理论渊源上,王国维独钟一家,朱光潜则博采众说;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悲剧,王国维先否定后肯定,朱光潜则持否定立场,在美学取向上,他们同属于审美功利主义。

【关键词】王国维 朱光潜 悲剧观念 悲剧理论 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9)10-0096-04

西方悲剧理论的引入,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进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戏剧和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悲剧理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悲剧观的确立,也被认为是中国文艺美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标志之一^{[1](P14)}。而在将西方悲剧理论引入中国并确立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过程中,王国维与朱光潜是两位关键性人物。王国维最早译介“悲剧”概念,并开创了将西方哲学和美学运用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先河;朱光潜则是第一位系统研究西方悲剧理论的中国学者,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悲剧美感作出了富有创见的解析。王朱二人将舶来的西方理论纳入各自的学术体系,形成了较为独立完整的悲剧观念,这在中国现代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中是少有的。比较二人悲剧观念之异同,对于我们考察中国悲剧理论与观念的现代发生及其演进,当有启发意义。

一、观念核心:“解脱”与“快感”

王国维的悲剧观最为集中的体现,是他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从根本上说,王国维的悲剧观源自叔本华,也始终没有走出叔本华。虽然《红楼梦评论》开篇即引用了老子的“人之大患,在

我有身”和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但这只是起一个引子的作用,其实王国维之意并不在老庄,而在于借此阐扬他的导师叔本华的悲剧人生观:“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2](P2)}在王国维看来,人生充满痛苦,痛苦来自欲望,欲望源于意志,而意志则始于“原罪”。“原罪”本是基督教的宗教术语,叔本华借以作为他的唯意志哲学的核心概念。叔本华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这个犯罪者就是亚当,我们都在亚当中生存,亚当是不幸的,而我们在亚当中也就都成为不幸的了”^{[3](P524)}。欲摆脱这种悲剧轮回,则需寻求解脱之道。而所谓悲剧精神,即“厌世解脱之精神”。那么怎样才能解脱呢?唯有拒绝意志,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办法有二:一是在对天才的艺术作品的忘我静观中获得暂时的平和与解脱,二是从根本上拒绝意志而达到人生的大彻悟、大解脱。显然,前者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后者才是永久的根本之途。此外,王国维还谈到了了解脱的两条途径:“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悲剧观念的现代转型研究”(07CZW010)中期成果。

* 作者简介:田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小说、戏剧研究。

苦痛。”^{[2](P10)}二者之中,王国维推崇后者。本此观点,王国维认为:“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同时他指出《桃花扇》的解脱是“他律”的,而《红楼梦》则是“自律”的,因此“《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而《红楼梦》的解脱才称得上真正的解脱^{[2](P13)}。在王国维心目中,《红楼梦》乃“悲剧中之悲剧”,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2](P28)}。

从王国维对《红楼梦》的悲剧性及其价值的评论可以看出,其悲剧理论几乎全部来自叔本华的哲学和悲剧美学,而其悲剧观的核心就是“原罪——解脱”说。这种从既定观念出发,以材料印证其观念的做法,是一种先验式的非科学的研究方法,势必会削足适履,结论难免偏狭。按照王国维的观点,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只有一部《红楼梦》堪称悲剧,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学者中,王国维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学,第一个将“悲剧”概念引入中国,第一个发现《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艺美学的现代转型之路。

朱光潜的悲剧观集中体现在他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中。这部著作一经面世(1933年在法国出版),就受到了西方学界的高度评价。法国学者夏尔·布朗达尔指出,朱光潜的研究是“最富有独创性的”,“这些最富有独创性的见解也是最值得争议的,但同时也是对我们最有教益的”^[4]。英国学者拉斐尔认为,朱光潜对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对建立一种全面的悲剧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论据”^{[5](P209)}。在《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从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切入,首先探讨了悲剧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于悲剧的审美态度问题。他认为“写实主义与悲剧精神是不相容的”,悲剧与现实之间应当保持适当的“距离”^{[6](P328)}。接下来,他集中讨论了悲剧“快感”的问题,对西方关于悲剧快感的各种学说逐一进行辨析,指出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在批评他人学说的过程中,朱光潜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譬如,他认为“悲剧的本质正在于它并不仅仅是可怕”^{[6](P337)};他提出了“命运感”的概念,认为它是悲剧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也是悲剧的主要特征之一^{[6](P547)};与此相联系,他又提出“悲剧感”也是悲剧的特有属性,“悲剧感基本上类似崇高感”^{[6](P548)};此外,他还探讨

了悲剧的“生命力感”、悲剧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对西方学界两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恐惧”、“怜悯”、“净化”、“崇高”等命题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阐释。

《悲剧心理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西方悲剧理论所作的系统研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光潜独特的悲剧观。如果说王国维的悲剧观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关注的重点是悲剧对于人生的“解脱”意义,那么朱光潜的悲剧观则更加具有科学实证的特点,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揭示悲剧“快感”的奥秘。虽然悲剧的快感问题并非朱光潜的新发现,但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并运用心理学方法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则是朱光潜的独到之处,也是他对于悲剧理论的一大贡献。

二、理论渊源 独钟与博采

王国维和朱光潜的悲剧观均来源于西方哲学和美学,但二人在接受西方理论方面又有着显著的不同。王国维崇尚“纯粹的学术”,认为叔本华是“纯粹的学术”的最佳代表,因此对其情有独钟、推崇备至:“自希腊以来,至于汗德之生,二千余年,哲学上进步几何?自汗德以降,至于今,百有余年,哲学上之进步几何?其有绍述汗德之说,而正其谬误,以组织完全之哲学系统者,叔本华一人而已矣。”^{[7](P382)}“十九世纪中,德意志之哲学界有二大伟人焉,曰叔本华,曰尼采。……自吾人观之,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7](P457—481)}言语之间,充溢着对叔本华的顶礼膜拜。应该说,在王国维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对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均有所择取,但叔本华带有强烈悲观主义色彩的唯意志哲学,显然更加契合王国维的个性和人生观,因此也就更加深得王国维之心。在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王国维全盘运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取外来之观点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8](P424)},这种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悲剧观的偏颇和狭隘。对此,王国维自己后来也有所意识。在《静安文集自序》中,他说:“渐觉其(叔本华)有矛盾之处,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客观的知识。”^[9]随着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涉猎的广泛和深入,王国维在很大程度上校正了早期的研究路数,由立足于西方理论转为植根于中国本土,由形而上转为实证研究,这在《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虽然如此,但就本质而言,王国维悲剧观所凭

依的哲学和美学基础仍是叔本华的唯一意志哲学及其悲剧理论,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

同样是以西方理论为依据研究悲剧问题,如果说王国维进行的是独钟一家的先验式研究的话,那么朱光潜从事的则是博采众说的学理性研究。朱光潜认为:“悲剧是具体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因此,认真讨论悲剧问题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也即以世界上一些悲剧杰作为基础。”^{[6](P295)}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它却恰恰反映出了此前悲剧研究普遍存在的缺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我们检阅亚里士多德之后两千多年的西方悲剧理论就会发现,研究者几乎全为哲学家,“他们不是用归纳的方法,从仔细研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拉辛和其他伟大悲剧诗人的作品中建立自己的理论,却是从某种预拟的哲学体系中先验地演绎出理论。他们提出一个玄学的大前提,再把悲剧作为具体例证去证明这个前提”^{[6](P295)}。因此可以说,朱光潜提出用归纳法来研究悲剧,是对先验论的反拨,从而也确立了更加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悲剧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在朱光潜看来,“研究悲剧快感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公平地检查从前的理论,取其精华。这样,我们就有希望形成一种全面系统的看法,消除偏见,解决矛盾”^{[6](P298)}。因此,在《悲剧心理学》中,他几乎将西方从古至今有代表性的悲剧理论全部予以收集评点。可以说,朱光潜是以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融汇百家之说,形成了自己客观公允的悲剧观。

三、中国悲剧:有与无

中国学者研究悲剧时,中国悲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就此给出自己的回答。王国维的悲剧观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前后期思想也不尽一致,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对中国悲剧的看法。在早期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对中国小说、戏曲的“大团圆”提出了批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2](P11)}联系到前文提到的关于《桃花扇》和《红楼梦》的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国维没有明言的结论:中国古典戏曲中没有悲剧。而在后来的《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

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P161)}王国维对《窦娥冤》、《赵氏孤儿》等中国古典悲剧的高度评价,既是对自身学术思想的一次超越,也为中国古典悲剧研究拨开了迷雾,开辟了道路。

朱光潜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用很强的道德感代替了宗教狂热,“乐天知命”是幸福生活的普遍的座右铭,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深信善恶终有报应。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伦理信念,所以中国人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中国文学在其他各方面都灿烂丰富,唯独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尾。”^{[6](P509)}朱光潜还以《赵氏孤儿》为例,分析了其与西方悲剧的差异。由此可见,朱光潜对于中国悲剧问题的看法与王国维早期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和角度略有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同,即中国古代无悲剧。两人的区别在于,王国维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而朱光潜此后再未谈及中国古典悲剧问题,因此我们只能视其为最终的结论了。

四、美学取向,审美功利主义

王国维和朱光潜的悲剧观虽然有所不同,但在对悲剧效用及其审美价值的看法上却是十分相似的。他们均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而使情绪得到“净化”的观点,同时又受到了以康德、叔本华、尼采、克罗齐等为代表的这一西方近代美学流派的深刻影响,其核心即为“审美无利害性”。所谓审美无利害性,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审美)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现象或其表现方式的一种判断力。”^{[10](P47)}也就是说,审美是一种无关目的、不涉利害、脱离社会功利和伦理道德的独立活动。王国维和朱光潜继承了康德的观点,他们都反对将悲剧作为宣扬道德和政治的工具,强调悲剧在审美上的无利害性,注重悲剧作为艺术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他们却都肯定悲剧对于人生乃至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力主悲剧审美的非功利性,一方面却又提倡悲剧的功利性,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但若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想发

展的大背景和总格局中来考察,就可发现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出于救亡图存和政治革命的需要,中国古代文艺观中源远流长的“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传统,近代由梁启超大力倡导,至现代的“左翼文学”达到极致。由于他们过分强调文艺的现实政治功用而忽视了其审美价值,因而导致文艺走向畸形。以王国维、朱光潜为代表的审美派的出现,恰恰是对上述偏颇的补充和纠正。同时,他们又不是照搬西方的审美主义学说,而是将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文艺观。这种文艺观可以用“无用之用”来概括,即对文艺作品的鉴赏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审美活动,而这种审美活动同时也于无形中有利于社会人生。换句话说,他们反对的是政治的直接功利,提倡的是审美的间接功用。

在悲剧观上,王国维和朱光潜有着相似的思路:王国维一方面强调文艺(美术)超越一切现实功利的“无用”。“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11](P534)]另一方面却又肯定悲剧可以使人们从“生活之欲”的束缚中得到“解脱”。朱光潜既强调艺术与现实、艺术悲剧与现实悲剧的“距离”,又认为悲剧可以净化人心,有利于实现“人生美化”。“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生,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生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2](P446)]

以王国维、朱光潜为代表的这种“无用之用”的文艺观和美学观,有人将其命名为“审美功利主义”。对于审美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杜卫的评价十分中肯:“审美功利主义思想从中国的具体语境出发,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作了‘误读’,提出了‘无用之用’的创造性命题,试图从审美的无利害性引申出洗刷人心、纯洁情感、拯救人生的人本主义启蒙功能,以独特的

方式来解决审美的无利害性与功利目的之间的二元对立,并由此成为了中国美学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现代传统。”^[13]

在比较了王国维与朱光潜悲剧观的异同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是王国维还是朱光潜,他们都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对西方悲剧理论的介绍和梳理上,而对中国古典美学中所蕴含的悲剧思想则未予关注,从而也未能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悲剧理论体系。虽然如此,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对他们求全责备,更不能抹煞他们在中国悲剧观念现代转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正是因为他们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中国现代悲剧观念才有了形成的可能,才有了赖以形成的坚实基础。他们所留下的空白,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 [1]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3][德]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英译本第一卷)[M].
- [4][美]邦尼·麦克杜哥.从倾斜的塔上瞭望——朱光潜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背景[J].新文学史料,1981,3.
- [5]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A].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 [7]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3册)[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 [8]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9]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
- [10][德]康德.判断力批评(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11]王国维.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 [12]朱光潜.谈美[A].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 [13]杜卫.中国现代的“审美功利主义”传统[J].文艺研究,2003(1).